



CDDC计划2007年出书, 稿件征集正在进行中, 欢迎踊跃投稿...

- 符号学VS新闻学
- 符号世界与符号异化
- 从结构主义到话语符号学

信息革命，是谁搞的鬼？——许勒对于信息社会的观点

时间：2002-8-29 15:31:02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刘昌德 阅读3952次

许勒教授的讣闻，透过e-mail传来。然而，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教授在千禧年之初的过世，并没有稍缓全球许多地区与企业迫不及待地投下大量资金与人力，抢搭所谓「信息时代」的列车。当天经由计算机网络传到我这儿的消息，还包括台湾的中华电信公司宣布，HiNet今年将大幅扩充频宽，将原有国内的ATM提升4倍频宽（IT home, 2000/1/31），以因应电子商务扩展之后预估将会暴增的资料流量。另外，据同日的报导，南韩人民以计算机网络散发「烂政客黑名单」、掀起政坛风暴，并传言将成立「网络韩国党」，运用网际网络动员选民（中国时报，2000/1/31）。

科技崇拜者会信誓旦旦地拿出上述南韩人民透过网络革命的例子，告诉你，传播科技的力量是可以翻转世界的。而且想想看，一位僻处第三世界国家的穷学生，也可以实时地从网际网络上同时得到左派学者过世、南韩人民力量崛起的种种讯息，这可不正是科技了不得的成就。因此，他们说，只要能够赶上这波全球信息高速公路（或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风潮，就可以从此享尽太平。

如此无可救药的天真想法，正是许勒教授批评的重点所在。

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贝尔（Daniel Bell）于七〇年代中叶写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之后，讨论信息与传播科技的发展逐渐成为显学；尤其在计算机的日新月异下，许许多多的「未来学家」纷纷「欢庆」信息社会的到来，并预言资本主义将因此消亡。包括波拉特（Porat, M.）与增田米二等人认为，当代的欧、美、日等社会，已经由生产农业及工业产品、转变为生产与传布信息与知识，也就由工业社会迈入信息社会；而在这样以知识与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中，藉由信息科技的发达，将可提供充足的信息与充分的互动，参与式的民主与完全开放的市场得以实现、阶级的不平等与国际间贫富国家的差距也可以因此打破（Dordick & 汪琪，1995：13）。

这样的观点充斥在主流的大众传播媒体当中，看看书店畅销排行榜中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数字神经系统》、《拥抱未来》，普尔的《第八类接触》、约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著作等身的「未来系列」，以及各类以网际网络或未来学为号召的书籍，大概就可以明了。

但是许勒早在八〇年代初期、计算机科技与网际网络尚未侵入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之前，便由分析美国「信息-军事」的复合体出发，考察信息传播科技发展背后的结构因素后，以一贯「谁在其中主导？谁在其中获益？」的质问（Schiller, 1973, 王怡红译：216），直指所谓的「信息社会」并无新意：所谓的「信息社会」，实际上只是堆积如山之信息的生产、加工、

与传输罢了，这些信息包山包海，囊括了个人与国家、社会与商业、经济与军事等等项目。而其中绝大多数的数据，其生产不过是因应先进工业国家中的大型财团、政府官僚组织、以及军事建置的特殊需求。（Schiller, 1981:25）许勒认为，即使在七〇年代末期——许多信息社会论者所称的「断裂」——之后，市场经济仍是科技与信息领域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所有新的传播科技发明、采用、以及制造，都是以符合市场准则为依归；而其中的受益者，仍是私人财团（ibid: xii）。因此，整个资本主义的体系并未被撼动，对许勒来说，信息科技的发展只不过是进一步加强与维护统合资本主义而已（ibid: 16; 1984: 1-3）。

不过这种认为新科技推翻资本主义的科技崇拜者、或是已经把资本主义进行历史分期的观点，在九〇年代后愈形帜烈，而且并不只限于对马克思主义抱持怀疑与敌视态度的学者，甚至是许多高举左派旗帜的学派所抱持的共同观点。从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到最近以「信息时代」三卷力作扬名立万的柯司特（Castells, M.）等，都一再强调信息科技对于资本主义根本性改变。

柯司特与许勒同样认为，二次大战后、尤其是七〇年代以降的信息科技发展，对于美国与欧、日等第一世界国家当时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有相当的缓解作用。柯司特指出，当代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范型，也就是「信息化经济」或「信息化资本主义」，对一度陷入成长停滞与能源危机的西方资本主义进行了「再结构」；透过对企业组织、劳动过程、以及传播媒体等转化（再结构）的过程，信息以连结全球市场体系、与激发成熟工业经济潜藏生产力的方式，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且进而成为此一经济体系的决定性因素。（Castells, 1996, 夏铸九等译）

科技与信息传播的发展：军事的需求

然而柯司特却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一样，造成经济、社会、文化等物质基础的断裂（ibid: 35）；同时，他也抛弃社会关系对于技术的影响，在此与许勒的观点开始背道而驰：当然，技术并未决定社会，社会也没有编写技术变迁进程的剧本，因为许多因素——包括个人的创造发明与企业的冒险进取——干预了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与社会应用的过程，导致最后的结局有赖于复杂的互动模式。（ibid: 4-5）首先，对于资本主义进行历史分期，尤其是这种含有「断裂性」意味的观点，就是在定义某种社会型态时，指出何者是具有根本决定性的因素（Wood, 1998: 28）。因此，柯司特的信息时代、抑或是所谓后福特的提法，即使还「愿意」在行文时仍三不五时提到资本主义，但究其实，这意味着信息（或柯司特所谓的「网络」）已经占据了资本主义的中心、甚至取代了资本积累的逻辑。例如柯司特就说道：「积累的公司精神、消费主义的新生外表，都驾驭了信息主义的文化形式。……但是当所有在一起的元素似乎要解试做为再生资本主义竞争的文化支持时，他们还是不足以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新的作用者——网络企业——做一区别。」（Castells, 1996, 夏铸九等译：206）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许勒坚信，所有信息科技的发展，一直以来就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也不具有任何自主性，而是为了一个简明的终极目标，建构与维系既有的社会秩序（Schiller, 1996b: 35）。以战后美国主导的传播科技发展史加以考察，在其中扮演主导力量的两个角色，就是美国的军事单位与跨国公司（Schiller, 1994）。许勒较为早期的著作，例如1969年的《传播与美帝》（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1973年的《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国际局势下，戮力扒梳五角大厦与国防部如何「武装」科学研究与传播科技发展。许勒指出，国防部透过拥有美国政府预算大饼中的最大部分，以决定经费补助等方式，主导传播科技的研发，并以此巩固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加速扩张，阻绝替代性的经济体制发展（Schiller, 1969）。他在《思想管理者》一书中指出：许多强大的工具，是与军队一起产生的，其任务是在全球保卫和拓展美国公司帝国。……第一批实验性分时制（time-sharing systems），也是由国防部提供的公共资金建立的……军事利益和私人的商业利益，已经主宰了新信息技术的发展……它是目前控制着美国资源决策的集中性私营经济结构过程和

机制的需要。(Schiller, 1973, 王怡红译: 216-217)

简言之, 透过对于五角大厦在美国与跨国信息产业中的角色分析, 许勒为了解所谓的信息革命, 其实莫不与美国军事需求相应 (Mosco, 1986: 76)。这点证诸在当前热得发烫的网际网络, 更知是所言不虚。网际网络的前身ARPANET, 活脱就是经由国防部赞助的研究计画而来, 其多元的传输路径概念, 在当前被视为一个在地的另类发声管道、可以突破主流大众传播媒体的封锁, 原始的目的却是用于对应核战威胁的产物 (Castells, 1996, 夏铸九等译: 360-361)。魏斯特 (Webster, F.) 指出, 许勒随后将科技的两个动力——企业集团与军事单位, 化约为一个, 也就是军事武力, 因为军方推动科技发展, 是要强力保护少数的资本集团 (Webster, 1995, 冯建三译: 143)。例如,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与航天飞机计画的研发, 最早便是因应军事的需求而产生。但这里是「鸡生蛋, 蛋生鸡」的问题。因为究其实, 虽然国防部的这些太空计画, (表面上) 是为了取得与苏联军备竞赛的优势地位, 但是承包研发与制造的Rockwell等私人公司, 从中获取大量的利润, 才是真正的最大受益者 (Mosco, 1986)。

因此, 在八〇年代末期到九〇年代之后, 冷战随着柏林围墙倒塌而逐步消退, 资本主义的全球势力大力扩张, 传播私有化的情况也愈发严重。因此, 许勒的分析更为着墨在商业力量对于信息科技发展的影响, 尤其是在有关信息商品化的主题。

科技与信息传播的发展: 商业利益的需求

发展中国家过去提倡科学发展时, 例如中国的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所要的「赛先生」, 所展现的迷思是: 科学是价值中立的, 科技的发展则可为所有的人民带来福祉。这当然是个迷思。今年三月中旬, 科学家对人体基因译码的工程获得重大突破, 美国总统柯林顿与英国首相布莱尔于三月十四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 人类基因序列及其衍生性研究的原始资料, 应该开放给全世界科学家。此一声明立即造成纽约华尔街股市的生化股股价应声大跌, 原因即在于如此应该是符合全体人类利益的政策, 对于这些生化公司的利益反而有损 (明日报, 2000/3/15; 工商时报, 2000/3/16); 这也显示, 如果该政策将来未能贯彻执行, 生化公司将如何运用这项原本应是人类共同财产的科学发现, 来中饱私囊。因此, 传播与信息科技的发展, 必须放在二次战后资本主义运作下、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复合影响下进行考察。许勒在1981年的《天晓得: 五百大企业时代下的信息》(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 检视在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运作下, 信息与电子工业的结构与运作, 包括如何构成、主导力量、游戏规则、以及其发展对整体经济系统的影响。其中, 最重要的关切点在于: 谁来作主? (Schiller, 1981: xvi-xvii) 基本上, 许勒认为传播与信息科技除了本身即构成一个利润惊人的市场、有效缓解了美国所遭遇到的经济危机之外, 还扮演了两个重要的角色, 一是可以整合跨国公司的生产、加工、分配、与行销; 二是深化其它边缘国家对于世界市场中心国家的依赖 (ibid: 16)。

首先, 信息与传播科技的发达, 使得全球化的市场成为可能。因为实时信息的流通、配合世界市场信息脉动的生产调整, 都必须有快速的信息传递才能办到 (Castells, 1996, 夏铸九等译)。因此, 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几十年内, 在数字化信息快速公路的协助下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现象 (Dawson and Foster, 1998: 58; Wood, 1998: 47)。

其次, 美国信息与传播工业, 挟着资金与技术率先起跑的优势, 在此一文化工业的全球市场中, 取得霸权地位、并加速其自身的资本积累, 在美国经济呈现衰退的时代中, 表现一枝独秀 (Schiller, 1994)。在信息工业方面, 美国的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市场的利益, 除了硬件方面的「蓝色巨人」IBM自七〇年代便在占有寡占地位之外 (Schiller, 1981: 30-32); 软件方面的Microsoft自九〇年代以Windows窗口系统崛起, 不但将总裁盖兹送上全球首富的金字塔

顶，其气焰嚣张到去年底以来，美国司法部积极调查其违反「反托拉斯法」证据、准备将其分割（中国时报，2000/1/14）。在媒体工业方面，包括好莱坞等跨国公司在全世界市场的「势如破竹」更是有目共睹，以1994年的台湾首轮电影票房为例，来自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市场占有率便超过85%，而第二名的港片只有不到一成、国片更低至2%左右（资料来源：台湾电影数据库）。

除此之外，许勒指出，二次大战时，军事工业蓬勃发展，战后为了因应情势的改变，将产品转型为民生物资的消费商品。但为了扩展市场、顺利推销「过剩」商品，以及因应包括德国、日本等其它工业国家产品的竞争，美国资本家就必须依赖广告工业（包含行销）的力量。传播在此扮演的角色，便是透过其在世界传播市场的优势地位，推销美国的商品与消费文化。

（Schiller, 1994）

传播新科技如电影特技、计算机动画、高画质电视、甚至是还在研发中的数字电视等等，对于许勒来说，不过是增加其「特炫效果」（special effect）的强度，来抓住观众的目光。他说，当前媒体商品以制造声光效果为目的、而与讯息内容的意义抽离，例如MTV与好莱坞电影，这种表现形式与意义互不搭轧的状况被部分学者称之为「后现代」，但其实重点并不在此。因为其目的不过是吸引注意力，然后在其中一方面推销美国式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也让广告商品直接整合进其内容与形式；所有的目的，都在于商业利润。（Schiller, 1996b）

再者，学者Tunstall指出，自七〇年代以来美国大力鼓吹各国对媒体市场解禁，是跨国公司所主导，以旗下占有优势地位的传播工业为马前卒，意欲扫除经营障碍、顺利进攻世界市场（Schiller, 1996a: 22）。例如，就在美国直播卫星电视市场趋饱和之际，我国于去年一月通过《卫星广播电视法》、市场门户开放，另外拉丁美洲在开放之后，预估付费电视市场至二〇〇三年将达一亿户（工商时报，1999/12/27），对于美国的跨国媒体来说，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获利泉源。

谁的信息爆炸？谁的信息贫瘠？

为了扩大商品销售的市场，广告工业必须充分地利用媒体。这就意味着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所有传播科技产物都要转变成行销工具。因此，在商业力量主导下的传播科技中，广告迅速切入所有的媒体（Schiller, 1994）。这点不仅造成欧洲公共广电制度的退却，同时在最新的网际网络媒体上，也造成商业泛滥的恶果。根据统计，我国网际网络1997年的广告市场规模为3500万元，1998年估计超过1亿元，已经成为网站的主要收入来源（施俊吉等，1999: 20）。

另外，媒体的私有化与跨媒体之间的聚合，也在快速地进行。例如时代华纳（Time Warner）与全球最大ISP业者美国线上（AOL）在年初的合并（中国时报，2000/1/11），或是香港李嘉诚家族旗下的盈动网络购并香港电讯（中国时报，2000/3/1），都展现了当代信息传播市场的寡占与商业化倾向，其中网际网络并不因为「年轻」而有任何不同。这样的媒体聚合，并不像许多学者所谓的是基于任何科技上发展的理由（Baldwin, 唐维敏等译，1997），其实是基于财务上的目的，因为过去旧媒体如报纸、电视、电影、唱片之间的整合，其来有自，原因都是基于有利可图，信息产业与旧媒体之间的整合并无特殊之处（Golding, 1998:71-72）。

在收入来源为广告所掌握下，媒体生产的信息，当然是以商业目的为依归。同时，在传播媒体所有权私有化之后，造成信息商业化的情形愈来愈严重。许勒指出，受到美国政府将数据处理等业务「外包」（contracting out）影响，政府的信息为私人公司所用，进一步导致政府信

息使用费率的提高，以及各种电子形式的资料增加，这使得一般人无法近用、进而剥夺了一般人的使用权。因此，信息的私有化与商业化，使其成为少数人才能够近用的商品，多数人所能获得的信息却愈来愈少，对信息的公共性造成伤害。（Schiller, 1996a: 19-22）

也因此，过去对于信息社会的迷思，认为发达与充足的信息将可以解决文盲、教育资源不足、劳资斗争、贫富国家差距等问题，也就确实成了神话。因为，在商业化的情况下，所谓的「信息爆炸」，泰半是商业信息、甚至多是付费信息，因此经济弱势者的需求当然无法满足，并且有证据显示，美国公共性的资料供应量在九〇年代之后，不增反减（ibid），当真是信息革命带来信息贫瘠。

其次，信息新科技的确带来更多的弹性工作空间，但是乐观者宣称会带来的「新专业阶级」（Bell, 1973），并未就此诞生。因为许勒认为，虽然少数的专业经理人从资本家手中取得部分权力，但他们仍是「为他人工作的人」；而且在七〇年代后，企业不断进行减薪、人事冻结与裁员，证实乐观主义者口中的天堂可还远着呢（Schiller, 1981: xvi）。

至于贫富国家的差距能否因着信息革命而缩小，以及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藉此「蛙跳」、一举「超英赶美」，许勒更是抱持怀疑态度（ibid: 3-6）。他说，目前所谓的全球化信息新秩序，并不是过去不结盟国家所期待的；这种天真的想法忽略了全球市场的历史性成因，也就是：全球经济的兴起，是在美国国内主要产业的压力及要求下所发展起来的。据他分析，「新」的全球化信息新秩序，主要信息流动为美国向其它第一世界国家输出信息与媒体和科技产品、其它第一世界国家则向美国输出原始资料；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向两者输出原始资料，其它两者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产品与加工后的信息。因此这个新秩序并未切断依赖关系、也从无意弥补过去的贫富不均。

未来：困境或康庄

美国政府于1993年提出的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计画中，有如此一段的描述未来生活的序言：「……你可以透过地区性的机构如图书馆等，直接获得政府信息，或是以电传方式提出申请、获知取得许可、并便捷地与有关人员直接取得联系。」而许勒是这样说的：

如果这种情况成真，那可不错。但其实这当中存在不少绊脚石，例如，那些愈来愈有影响力的付费数据库，会愿意免费提供服务吗？……综言之，NII计画的「想象」，以及与之一鼻孔出气的网络高速公路愿景的热衷者，其实提供给我们的是更多的疑惑、而非希望。（Schiller, 1996b: 80-81）

只是许勒毕竟不是悲观的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者，作为新世界信息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的倡导者之一，他针对阶级与经济结构进行分析，并不是为了打击革命的信心，而是为了厘清既有的所谓「信息社会」的受益者究竟是谁。

许勒认为，虽然「知识型劳工」尚未足以成为新阶级，但这些专业工作者对于新科技中人性需求的重视，不应被左派忽视，而要视为一个「民气可用」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地的社区与弱势者集体行动、以及过去不结盟国家合作对抗美帝，都是许勒认为的「可行之计」

(Schiller, 1984: 125; 1973, 王怡红译: 230-235)。

因此, 类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南韩人民利用「网络」, 来集结力量反官倒, 如果许勒教授可以亲见, 应感欣慰。只是别忘了, 网络本身并不革命, 因为其所由生原是服务资本家利益。革命的是人。

参考书目

- Baldwin, F. (1997), 唐维敏等译《大汇流: 整合媒体、信息与传播》。台北: 亚太。
- Bell, D. (1973), 高铨等译,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台北: 桂冠。
- Castells, M. (1996), 夏铸九等译, 《网络社会之崛起》。台北: 远流。
- Dawson, M. and Foster, J. (1998) Virtual Capitalism. In McChesney, R., Wood, E. and Foster, J., (eds.)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Dordick, H. & 汪琪(1995), 《寻找信息社会》。台北: 三民。
- Golding, P. (1998) Global Village of Cultural Pillage? In McChesney, R., Wood, E. and Foster, J., (eds.)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Mosco, V. (1986) New Technology and Space Warfare. In Becker, J., Hedebrø, G, and Paldan, L., (eds.), Communication and Domination. NJ: Ablex.
- Schiller, H. (1969)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August M. Kelley.
- , (1973), 王怡红译, 《思想管理者》。台北: 远流。
- , (1981) 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 NJ: Ablex.
- , (1984) 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 NJ: Ablex.
- , (1994)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Market: the Interacting Dynamic. In Bender, G. and Druckrey, T. (eds.), Culture on the Brink: Ideologies of Technology. Seattle: Bay Press.
- , (1996a) Information Deprivation in an Information-Rich Society. In Gerbner, G., Mowlana, H., and Schiller, H. (eds.), Invisible Crisi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 (1996b) Information Inequality. NY: Routledge.
- Webster, F. (1995), 冯建三译, 《信息社会理论》。台北: 远流。
- Wood, E. (1998)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or Capitalism? In McChesney, R., Wood, E. and Foster, J., (eds.)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施俊吉等, (1999), 《网际网络发展与竞争法相关问题之研究》。台北: 公平会。

转自北大新青年中国学术城

文章管理: 肖克 (共计 794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 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 信息革命, 是谁搞的鬼? ——许勒对于信息社会的观点 会员评论[共 1 篇] →

💬 言辞恳切, 深中其要啊 [aoxi ao于2003-3-30发表]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码:



提交

重写



[关于CDDC](#) ◆ [联系CDDC](#) ◆ [投稿信箱](#) ◆ [会员注册](#) ◆ [版权声明](#) ◆ [隐私条款](#) ◆ [网站律师](#) ◆ [CDDC服务](#) ◆ [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 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 [MSC Status Organization](#) ◆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 [版权所有](#) ◆ [不得转载](#) ◆ [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 如有违反, 追究法律责任.